

# 明代北京的刻书

张秀民

明永乐十九年（1421）自南京迁都北京，北京又成为首都，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永乐以后太监权重，后来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如魏忠贤等，更是掌握实际政权，皇帝只不过是供他们愚弄的傀儡。太监们多至数万人，在北京城内设有二十四个衙门（所谓内府十二监、四司、八局）。政府出版事业也归他们司礼监掌握，这和宋、元与清朝都不相同。司礼监经厂库有提督总其事，下有“掌司四员或六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并《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sup>①</sup>。嘉靖初司礼监内有刊字匠三百十五名、刷印匠一百三十四名、搯配匠一百八十九名、表背匠（装订匠）二百九十三名，及笔匠、墨匠各数十名<sup>②</sup>。刊印装背工匠多至数百名，相当于现代的小印刷厂、装订工厂。这些刊字匠、刷印匠刊印了不少书籍，“制书”有《皇明祖训》、《大诰》、《大明律》、《大明令》、《御制文集》、《为善阴隲》、《孝顺事实》、《内训》等三十余种。内府刊书主要目的就是为宣传这些帝王图书，大部分在南京刊过，而北京又加以重刊。而宣宗《外戚事监》、《历代臣鉴》为宣德元年（1426）赐皇亲及群臣。《五伦书》，正统十三年（1448）制序颁行。《君鉴录》为景泰五年（1454）颁于群臣。宪宗御制

<sup>①</sup>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亦名《芜史小草》卷十八

<sup>②</sup>明万历刻本《大明会典》卷一八九

《文华大训》，则为嘉靖八年（1529）刊行，这些书当然出版于北京。又刊有《兴都大志》、《朱子纲目》、《续通鉴》、《贞观政要》、《李诗》、《杜诗》、《素问》、《难经》、《居家必用》、《饮膳正要》等<sup>①</sup>。正统十二年（1447）因《五经》、《四书》经注，书坊刊本有差讹，命司礼监誊写的本，重新刊印。同年又新刊《对类》，景泰七年（1456）刊《寰宇通志》。

宣德四年（1429）特设文书房，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后以词臣任之。“文书房”又名“内书堂”，专选小太监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每人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次第给之。宫内又教宫女读书，能通者升女秀才、女史等。宫女的启蒙课本除与小太监相同者外，又多《女训》、《女诫》等妇女读物。这两类课本当然是由司礼刊印供给的<sup>②</sup>。

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所载书目约有一百七十一一种（一作一百六十种，或作一百四十种。明有《内府经厂书目》二卷，今未见）。合明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载内府书八十三种，两者除去重复，当在二百种左右。

北京内府刻了三部大书，即《佛藏经》、《番藏经》与《道藏经》。太宗（成祖）为“图荐考妣在天之福，刊梓《大藏》，用广传施”。“缮始于永乐庚子（1420），梓成于正统庚申（五年，1440）”<sup>③</sup>，卷首冠有正统五年十一月御制序，称“大藏诸经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毕刊印，式遂流布”。千字文编号，始“天”终“石”。五行，行十七字。万历的母亲又增刻四十一函，始“鉅”终“史”，四百十卷，称《续入藏经》，而释

①明周弘祖《古今书刻》

②《莞史小草》卷十六

③万历御制圣母印施佛藏经序

典大备<sup>①</sup>。称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简称《北藏》，共六七七函，六七七一卷，十八万八十二页。《北藏》在正统间曾颁赐天下寺院，大官若有请求，也可得到<sup>②</sup>。成化、万历间又加敕造、颁赐天下名山。其中单是山西五台山一处，先后派太监送去供奉的就多至十藏<sup>③</sup>。故过去南北名山古刹，多有藏本。

西藏文大藏经，明代称《番藏》。《番藏》在元代已有刊本，至明成祖又重新镂梓。永乐八年（1410）御制《藏经赞序》称“念皇考妣生育之恩，劬劳莫报，乃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纸印施，以资荐扬之典，下界一切众黎，均沾无涯福泽”。所谓遣使取经，乃指中官候显及大智法王往西藏取得“梵笈藏经，归，敕寿梓于番经厂，先印一藏，送五台山菩萨顶供养”<sup>④</sup>。据说永乐版藏文藏经，是西藏奈圻古板的覆刻，只有《甘珠尔》，朱色印本。万历三十三年（1605）又据永乐本重刻，并添刻四十二帙续藏，称万历板。刘若愚说：“番经一藏，计一百四十七函（一本作一四五函）十五万七十四页。”抗战时期日本人曾在五台山罗喉寺发见云。

明代帝皇既信佛教，又信道教。太祖既刊《南藏》，集注《金刚经》，同时又注《道德经》。成祖刊印《番藏》，御制《神僧传》，同时又撰《神仙传》。到他们的子孙世宗，则更迷信道教了。英宗既完成成祖的遗志，刊完《北藏》，同时又刊成《道藏》，自然也不足为奇了。明代到了英宗，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

①万历五年御制续入藏经序

②正统十二年“工部右侍郎王祐言，刊造大藏经，颁赐天下寺院。臣原籍山阴县，柯桥禅寺乃臣家供奉香火者，伏乞赐经，俾寺僧朝夕奉诵，以祝圣寿。从之。”见正统实录

③康熙《清凉山新志》

④同上

息，民康物阜，海内富足，故能重建北京三大殿，重铸针灸铜人，又以精铜制作著名的天文仪器十件（铜人与仪器今均存），并废除最野蛮残酷的宫人殉葬制。宋、金、元有不少道藏板，但早已无存。正统九年（1444）刊《道藏经》，“十二年二月（1447）刊造毕，命颁天下道观”。<sup>①</sup>这次刊道藏的动机，见于他的发愿文，说：“……风俗敦厚，刑罚不用，华夏归仁，四夷宾服，邦国巩固，宗社尊安。……”但事与愿违，不过两年，他在土木竟被人俘虏了。正统《道藏》四百八十函，始“天”字，终“英”字，五千三百五卷。《续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续刊，始“杜”字，终“纓”字，三十二函。正续道藏共五百十二函，十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九页（一作十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九页）。半页五行，行十七字，与北藏同，也作梵笈装。正统道藏板片，清代贮于北京西安门内大光明殿，庚子八国联军入京，存板尽毁，印本难得。清代杭州火德庙、苏州玄妙观、江宁朝天宫均有藏本。今惟上海图书馆、太原崇善寺有全藏。北京图书馆所藏为北京西便门外白云观旧物。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曾据白云观藏本影印，惟已易梵本为线装一千一百二十册。学者始得睹《道藏》之全貌。《道藏》为唐宋道士们仿《释藏》而編集，有的虽杂虚伪荒诞<sup>②</sup>，但也保存不少古代哲学、医学、卫生、文学、史地的著作，极有参考价值。

周氏《古今书刻》内府有《道藏经》、《佛藏经》，而无《番藏经》；但却有《永乐大典》。这部最宝贵的稀有巨著，明清记载中似乎尚未有过刻本的记载。“万历甲午（1594）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

---

①正统实录

②宋代道藏收进并了波斯（今伊朗）摩尼教经典

忙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sup>①</sup>。陆氏倡议刻梓，终未成为事实。不仅未见刻本，即永乐原钞本，清人及近人亦未见过。今所存残本二百余册，均为世宗末穆宗初高拱等重钞副本。不知周氏有何根据，令人难信。

经厂库内所藏累朝遗书，到万历末期，多被匠夫厨役偷出卖掉，屋漏，书板湿损模糊，有的被削去字迹，改作别用，有的被劈作劈柴，烧火取暖，有的蛀成玲珑板，有的尘霉如泥板，损失日趋严重。保管的大监根本瞧不起这些破烂板子。因为是内廷库藏，一般官员又不敢过问<sup>②</sup>。从这点也可看出晚明政治的腐败了。

经厂本板式宽阔，行格疏朗，多为大本子，相当于西洋印本书所谓folio。大黑口，双鱼尾相向，大黑双边，正文小注，断句加圈○。字大如钱，多赵体，悦目醒神，用上好洁白棉纸佳墨所印。首册或钤“广运之宝”朱印玺。多包背装。外表大方。明人以“监书、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sup>③</sup>。所谓“监书”当指司礼监书，非谓国子监本也。经厂本为过去藏书家所诋斥，以其出自奄宦之手，因其人而及其书，自非公论。

北京国子监简称“北监”或“北雍”，以别于南京的南监南雍。北监刻书多据南监本为底本，不及南监之多。成化《国子监通志》卷九载有书板数目四十七种。于每种下注明版片数，如《新刊大明律》板一百九片。又有《务本直言》、《敕渝授职到任须知》、《本草方》、《幼小方》、《脚气方》、《楚辞》、《唐诗》、《樊川集》、《临川集》、《淮海集》、《东莱集》、《青云赋》、《玉浮图》、《孟四元赋》、《珍珠囊》等板。弘治《国子监续志》<sup>④</sup>卷八书板又有《古史》、

①清阮葵生《茶余客话》

②《尧史小草》卷十八

③明太平老人《袖中锦》

④成化、弘治《国子监志》为天一阁藏本，蒙洪可尧同志录示，特此致谢。

《山海经》、《千字文体》、《大学衍义》板等六十六种。两者均以普通经书为多，除去重复，共得八十五种。续志称“本监特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可谓重矣。”可知监中重视印书，随时可命刷印匠印刷。自成化三年（1467）至弘治十六年（1503）不及四十年，“书既散亡，板亦蠹坏”。故于每书名下多注见在板数，如《小学》板一百四十一片，续志作见在板一百三十五。其他各书板亦多有短缺。

嘉靖《皇明太学志》经籍志把国子监书板分为“堪印书板”及“残缺不堪印书板”两大类。每一书下注明板块数目。前者如《敕谕监规》十块，《国子监通志、续志》共一百六十九块、《侯伯习礼》二十五块、《药性珍珠囊》十四块、《四时气候图》四块等，共二十二种。后者残缺不堪印如《幼小方》二十四块、《本草》四十五块等，凡四十七种。又有《世史正纲》、《进修录》为祭酒邱濬刻。《诗乐图谱》、《春季考录》等五种，为吕柟刻。而《官箴》、《学的》为旧志所无。隆庆及万历《临雍录》、《辟雍纪略》，当为后加。

明有单行本《国子监书目》一卷。周氏《古今书刻》所载北监刻书仅四十一种，似据监志抄录；惟《大都志》为正续监志所无，或为后来所刻。

北监所刻最重要者有集经学大成之《十三经注疏》（万历十四年——二十一年刻1586——1593），又有《二十一史》（万历二十四年——三十四年刻1596——1606）。北监《二十一史》为司业张位所刻，费工部六万金<sup>①</sup>，系据南监本重雕。两监一再雕刻《二十一史》，清乾隆武英殿又据北监本校刊《二十四史》，这些正统史书之能广泛流传，两监之功不可没。惟北监本板式凌

<sup>①</sup>北监十三经，二十一史，刊刻时间，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北监二十一史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一

杂，字体时方时圆，校对鲁莽，讹舛较多。辽、金诸史缺文，动至数页，《仪礼》脱误尤多。明沈德符讥为“灾木”。清初著名学者顾亭林说：“秦火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因噎废食，未足为定论。《大都志》与《析津志》为北京最早之地方志，均无传本。

北京都察院刻了不少书，明有《都察院书目》，今未见。周氏《古今书刻》所载三十三种，有《算法大全》、《七政历》、《千金宝要》、《武经直解》、《史记》、《文选》、《杜诗集注》、《千家注苏诗》、《盛世新声》、《太平乐府》、《玉音海篇》、《披图测海》、《唐音》、《适情录》……等。值得注意的还有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过去有人认为监察衙门而刻小说，不够严肃。藏书家未见有这两种都察院本的著录。可能与司礼监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已均亡佚。

礼部除刊有《大狩龙飞集》、《大礼集议》、《素问钞》、《医方选要》外，每三年刊行《登科录》与《会试录》。

宋代已有《登科录》，传世者有两种。①《登科录》是记载进士的名册，又称《进士履历便览》或《同年序齿录》，其性质相当于近代学校的毕业同学录。封建时代士子所梦寐以求者，为中举，登进士第，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尤其中状元，更为无上光荣。②其实历代状元多半徒有虚名，明状元中有学问的只有杨慎、焦竑等少数人。世人多知王阳明（守仁），而其父状元王华反没无闻。然明清重进士出身，视为正途，其飞黄腾达为卿相者，多属此辈。明初状元江西人不少，后多为江浙人。嘉靖初每科进士约取三四百名，登第者不但在北京国子监刊石立碑，又由礼部刊行《登科录》。

①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又宝祐四年文天祥登科录

②连中三元，最为难得。明代只有浙江淳安商辂一人。其先本西夏人。

《登科录》内容有殿试录取的全部进士名单<sup>①</sup>数百名，每人名下注明籍贯，字号，生年月日，年岁及曾祖、祖、父母、兄弟名字简历。附载考试题目及状元榜眼等对策原文。

《会试录》也由礼部刊行，《会试录》刊载全国举人赴京礼部（相当于今教育部）会试中式举人名单，第一名俗称会元。成化年间每科约中式二三百名。又有一种《乡试录》<sup>②</sup>为各省刊行。

自北宋仁宗以来，殿试题目皆刊印。“明朝乡会试，殿试题纸皆摹印遍赐”<sup>③</sup>。统一刊印考试题目，主要为的是防止泄密。

《明史艺文志》与《千顷堂书目》载明历科殿试录，历科会试录各七十卷。若以三年一科计，当不止此数。国内藏此类书最多者，以宁波天一阁为首屈一指。登科录约有五十余种，最早者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最晚者为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永乐全缺，其它亦不全。会试录约四十种。各省乡试录最多，约二百八十种。过去或以为封建糟粕，其实保存了大量明代罕见的传记资料，惟至今尚未被人利用。

兵部除刊行《大阅录》、《九边图说》、《九边图》外，又刊历科《武举录》。然明、清两代重文轻武，中式武举、武状元者，不如文者之受重视。

工部只刊了《御制诗》一种。太医院刊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及与业务不相干之《大明律直引》。

钦天监除印有《天文刻》外，又每岁奏准印造《大统历日》，

---

①全部名单分为三等：第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人数较多，赐进士出身。第三甲人最多，赐同进士出身。

②乡试录由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及各省刊行。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省秀才赴省城应试。有一定名额，如浙江、湖广各约九十名。第一名即解元。乡试录载三场题目及考试官、弥封官、搜检官等职事官名。

③见明董其昌《学科考略》（学海类编本）

颁行天下。历书外皮上印有“伪造者依律处斩，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sup>①</sup>。自唐以来即严禁私印历书，明代私印宝钞与私历，同样处斩。但私历比较少见。《会典》载钦天监有裁历匠二名，表背匠一名，刷印匠二十八名，而司礼监也有裁历匠八十一名。可见印造历书之多。据朝鲜郑元容说：“皇明历式有二，曰‘王历’，曰‘民历’。每岁造大统历，先期二月初一日进呈来岁历样，然后刊造一十五本，送礼部，颁于两京及布政司，照样刊印。”<sup>②</sup>所谓“王历”疑为颁至各藩王及遵奉大明正朔的各国，而“民历”则在国内通行，在廷大小文武百官，亦可各得一本。明自洪、永以来颁发给大统历的国家，有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爪哇、旧港（两者均今印度尼西亚）等国。现在不论王历、民历与历样，已很难找到。现存较早者有天顺大统历。明代历书多黄绫包背装，也有纸面的。有少数摺本，除墨印外，有个别蓝印的。

顺天府刻有《府志》、《金台八景诗》、《寰宇通志》、《史钺》、《观梅数》、《大宝箴帖》……等八种。

明代北京书坊可考的七、八家，只及南京、建阳书坊的七分之一。计有：

北京永顺书堂又作永顺堂

金台鲁氏

国子监前赵铺

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金台岳家

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汪谅金台书铺

刑部街住陈氏

---

<sup>①</sup>见大明嘉靖廿三年岁次甲辰大统历，又大明崇祯八年大统历（黄绫面，蓝印本）

<sup>②</sup>郑氏《文献撮要录》卷一

## 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

### 隆福寺

永顺堂本为过去藏书家所未见过。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平整土地时，在明代宣姓墓中发见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用竹纸刊印的十一种说唱词话，和一种南戏《白兔记》<sup>①</sup>。在《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封面上端横书“北京新刊”四字。书名前多冠“新刊全相说唱”字样，书名页上刻着“全相说唱词话”，主要为七字唱句，有说有唱，有《说唱石郎骑马传》、《说唱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断乌盆传》、《断曹国舅公案传》等。《包龙图断白虎精传》长达九百多句，全部为七言唱句，没有说白，但书名仍题“说唱”。说唱词话是唱本鼓词、弹词的祖先。北京自宣德顾佐上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sup>②</sup>。成化间金台鲁氏刊有《四季五更驻云飞》<sup>③</sup>等薄薄册子四种。为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最早明代唱本。

国子监前赵铺，弘治丁巳十年（1497）刻《陆放翁诗集》。金台岳家弘治戊午（1498）季冬重刊印行《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郑振铎先生已影印在古本戏曲丛刊中）。刑部街住陈氏新刊《律条便览直引》封面书签印《大明律》三字。金台书铺汪谅嘉靖元年（1522）依宋元板翻刻《史记》、《玉机微义》、《武经直解》、《杜诗》、《苏诗注》。又依古板重刻《潜夫论》等共十四种。在《文选》后面，出现了正式出版广告<sup>④</sup>。铁匠胡同叶铺“麒

①赵景深谈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见文物月刊1972年11期

②据旧稿，忘所引书

③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

④“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下列书目十四种，除上述七种外，又“翻刻解注唐音。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韩诗外传太古遗音大全臞仙神奇秘谱诗对押韵孝经注疏俱古板”惟俱不列价目。案臞仙秘谱为明朱权所撰，并非古板。

麟为记”，万历十二年（1584）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一卷（蓝印），同年又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便览》二卷（中央与地方官员名录），开清代琉璃厂书铺刊《缙绅录》之先河。隆福寺为东城第一大庙（现改为商场）与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摊肆林立，旧均有庙会。隆福寺明代刊有《词林摘艳》、《五音篇海集韵》二种。

万历廿九年（1601）正月，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到北京，过了四年（1605）创建了南堂（即今宣武门外之南堂）。以后葡萄牙、法国、德国的耶稣会士相继来京。他们认为文字宣传是有力的武器，所以刻苦攻读中文，翻译教内书籍，编印散发。利氏的《天学实义》（后改名天主实义）南堂就出版了两次。南堂所出教会书籍可考的有《圣经直解》等三十九种<sup>①</sup>。

北京自永乐筑内城，周围方四十里。嘉靖又筑外城二十八里。市区扩大，居民增多，成为北方最大的消费都市。从明人彩绘的《皇都积胜图》（绢本）长卷中可以看出大明门<sup>②</sup>一带摊贩林立，百货云集，有卖扇子、毛巾、锁匙、鞋子、钟鼎、古玩、书籍等。北京虽刻书，但并不多。明胡应麟云：“燕中刻本自稀，然海内舟车辐凑，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鞏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sup>③</sup>燕京一般用纸及雕本，须用南方纸，南纸道远，印本成本加大。北京多达官贵人，有的喜藏书，举子进京应试者多，故书价最贵。胡氏又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闾阖也，临安也。”胡氏又云：“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阴历二

<sup>①</sup> 详见徐宗泽《耶稣会士著述目录》

<sup>②</sup> 大明门清改大清门，民国改中华门。遗址在今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

<sup>③</sup> 少室山房笔从甲部经籍会通四

月十二日传为百花生生日)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北京为书籍最大集散地,直至近代仍如此。不过清与近代书肆均集中在宣武门外琉璃厂,一部分则在隆福寺一带,与明代又不同矣。

1979年2月于山乘县瞻山7月补正于北京

## 稿 约

本刊欢迎下列内容的稿件: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其研究著作的介绍;

中国古代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碑拓、档案、文书、手稿等各种形式的文献)的介绍、考证与研究;

中国近代和现代重要论著或资料的介绍、考证与评论;

外国各门学科的重要论著或资料的介绍与摘译;

中外重要参考工具书的介绍与研究;

重要文献的作者与有关研究者的介绍;

国内外编纂、出版、收藏文献资料的目录索引和动态报道等。

来稿字数不限,但力求简明扼要。引文、引用的材料和数目字等,请作者自行核对并注明出处,如需要插图,请将照片寄来。来稿望用方格纸书写清楚。望勿一稿两投。文章一经发表,酌致稿酬。

来稿时请写明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发表时署名听便。

来稿请寄北京市文津街7号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